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

主持人 杨金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党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丰富发展。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刊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的深远历史意义》和《中国共产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目标的百年历程》。前一篇文章回顾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的辉煌历程、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特别是用扎实的史料充分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建立了当今世界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也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由此,指导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后一篇文章回顾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教育培养的历史进程、丰富经验和内在规律,指出这不仅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秀青年人才,而且为新时代进一步教育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昭示了正确方向和光明前景。

希望通过这两篇文章,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的研究,深化对青年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和培养的研究,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推动我国青年工作上新台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的深远历史意义

■ 杨金海 杨佳明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以及大量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大国;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与经典作家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收稿日期:2021-07-10

作者简介:杨金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杨佳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民族的科学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近代以来乃至数千年文明史上最深刻的变化。在新征程上,赓续马克思主义伟大精神,弘扬传播真理的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典著作翻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创新发展的一百年。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对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辉煌历程和巨大成就

鸦片战争以后,在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真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由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与我国近现代政治史、革命史、思想史的分期一致,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即从1899年2月马克思的名字传入中国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其中又分为两个阶段,即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前者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后者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前一阶段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学术思潮而并未当作革命的指导思想来传播,因此是一种自发的传播,而且是片断的、旧文体的传播。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则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新观察中国与世界命运的思想武器来传播,因此由自发翻译介绍转变为自觉翻译研究,并从片段翻译进入到完整著作的翻译,从文言文翻译转变为白话文翻译,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开始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和共产主义小组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播,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时期以及延安时期。后两个时期又分为两条战线,即革命根据地内部和外部的传播。在建党初期,包括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推动者。大革命失败后,党不得不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内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局部地区执政党,由此成为科学理论传播的主要领导者。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逐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研究和教育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党积极推动根据地以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团结了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一批进步出版机构和以“左联”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的翻译家、思想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更广大地区进行传

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通过延安整风和在全党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次高潮,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传播,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央编译局为代表的马列著作翻译研究机构、以人民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发行机构,以及全国各个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马列教研室或研究室相继建立起来,以此为基础,逐步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出版家和教育家,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中文第一版,编辑出版了“三大选集”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并编辑出版了一系列马列著作的单行本,还翻译出版了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本和若干经典著作的盲文本。与此同时,在全社会,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成为时代风尚。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我国各级学校和党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大众文化、制度文化发展等均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这就为彻底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和新型文明提供了可靠的思想理论保证。

四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即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此相应,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围绕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推进。一方面,坚持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继续编译马列经典著作。从1982年开始,中央编译局以及有关单位的学者一起用了近十年时间完成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由原来第一版的39卷扩充为60卷,2017年又完成了增订版编译和出版工作,使这一版成为当今世界上卷数最多、收录文献最多的列宁著作集。从1986年开始,中央编译局陆续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计划出版70卷,目前已经出版30多卷。同时,修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库”等。另一方面,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选编了大量经典著作的专题文集。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编译出版了《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农业若干问题的部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合作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无神论》等专题文集。进入新世纪后,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述摘编》等一系列党员干部读本。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编译出版了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我国学术界还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一系列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新教材,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些都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为深入研究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学理支撑。

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传播,即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逐步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建设工作,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学习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

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2018年3月,党中央为构建理论研究综合体系,将中央编译局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保留中央编译局牌子。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工作十分重视,将其作为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重要工作来进行安排。全国高校和各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取得空前成就,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思政课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理论研究基地建设等,促进思想理论教育成效显著提高。同时,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近几年来,党中央还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等,在全党全社会号召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大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为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以及大量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从而使我国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大国。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展,还形成了与经典作家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全民族的科学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代以来乃至数千年文明史上最深刻最巨大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3]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应当自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

二、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的历史经验弥足珍贵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传播、运用和发展的伟大历程中,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百多年前,严复在其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翻译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即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者们既继承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翻译传播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比如在延安马列学院时期已经形成了“追求理想,传播真理,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这些经验在后来长期的翻译传播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一是追求真理的崇高风范。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出版家、教育家之所以能够矢志不移,不畏艰难,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就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始终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郭沫若1924年从日本回国,计划翻译《资本论》,有人劝他放弃,原因是这项工作会耗尽心血。他说,如果为翻译《资本论》而死,那就死得光荣,死得其所。潘冬舟为从事翻译《资本

论》等革命工作,被叛徒出卖而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的著名翻译家周亮勋为翻译马列著作倒在工作岗位上,在昏迷中还在喊“开会”“稿子”,在他的心中,只有工作,传播真理的使命高于一切。像这样动人的故事不胜枚举,充分展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崇高风范。

二是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既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比如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这些经典著作犹如百科全书,涉及各个学科的知识,要准确翻译,需要付出加倍努力。著名翻译家张钟朴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为翻译《资本论》中关于我国武夷山茶叶的文字,他们求教了許多人,最后到福建调研,才从当地的方言中了解到有关词语和地名的确切含义。因为这些词语在翻译为英文等过程中发生了变音。在这些经典著作的出版、研究、教学等领域,很多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都是这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真理才能在中国大地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

三是集体攻关的合作精神。古今中外翻译工作很多,但像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这样集体合作,而且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的经典著作翻译工作已经具有集体性,但真正大规模地集体合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先后成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和中央俄文编译局,1953年又将这两个机构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由此,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体攻关,即以编译局同志为主,同时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同志参加,还邀请了苏联、德国等外国专家参与。从事编译研究工作的专家既分工负责,又通力合作,大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发挥集体智慧作用,借鉴前人成果和经验,由此打造出一卷又一卷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每一卷著作的问世都经过几十道工序,包含着许许多多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很难说清这些译作是谁的作品。因此,这些书上多半没有留下这些专家的名字。在研究和教育领域也是这样,例如在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以及思政课教学中,开展集体研讨、集体备课等已经成为常态。

四是学以致用与实践品格。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翻译研究,其目的在于武装人民,指导中国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因此,翻译研究工作者充分考虑了语言的科学性,包括规范性、典雅性、通俗性、民族性。中文版经典著作所用的语言是白话文,不同于五四运动之前的文言文;所用的语法是日常表达语法,并吸收了西方现代语法的合理成分;所用术语吸收了大众语言,同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词语,还借鉴了日语中的一些汉字词汇。这样,就形成了更加科学的现代学术语言,更易于人们学习研究经典著作。在翻译研究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还撰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材料,使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与中华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翻译出版的有力配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翻译、研究和出版、发行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环节。1920年8月,我国第一部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问世就是翻译研究和出版发行紧密联系的典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自觉地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先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华兴书局、延安解放社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书店也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三联书店”在这方面贡献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成立人民出版社,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又成立了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也适当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出版发行机构的配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成果和大众普及读物不断问世,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思想理论水平。

六是教学体系的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要走向大众,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于是,马克思主义教学体系以及相关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应运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党成立的很多学校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成立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等,并设置课程,编写教材,培养师资,形成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进一步借鉴苏联经验,在高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不断更新。自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学院或研究院纷纷成立,组织编写了一系列反映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形成了新的教学体系、科研体系和师资队伍。在各级院校和干部学校,广泛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同时,大力推进面向社会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的与时俱进。

除上述几点基本经验外,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反过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的时候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为此,十分注重自觉地组织领导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学习和运用。在党的创立时期,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组织翻译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十分艰难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始终不忘组织翻译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和大众化工作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研究、出版、教育等机构和相应的制度体系,取得了大量的翻译、研究、学习和实践成果,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大国、研究大国、实践大国,使我们党成为真正的学习型政党,并带动整个社会逐步成为学习型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应当永远铭记并不断发扬光大。

三、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力量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总结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100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伟大实践交相辉映、相互促进的百年历史洪流。

其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成长起来,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心骨。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1920年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和共产主义的书，其中有三本书特别铭刻在他的心中，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走上革命道路的。1919年，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就通过日本的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知道了《共产党宣言》一书；1920年10月赴法留学，和当时先行留法的蔡和森等人一起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等，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4]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十分重视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到，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曾打着手电筒在晚上读《共产党宣言》，并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5]，只有这样，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他还说：“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6]。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也深刻影响了亿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此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变被动为主动，变被蹂躏者为革命者，变落后者为先进者，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形成的自卑自弃、思想懦弱、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凝聚起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开拓创新，不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进一步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曙光。这一切都跟马克思主义指导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比如建立工农政权，由人民当家做主；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制定多种经济并存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正是通过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我们党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这就为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等制度体系。我国的根本制度体系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全面依法治国等方面制度。它彻底改变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种弱肉强食、官僚主义、损人利己等发展逻辑，实现了“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由此，我们的制度体系才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谐稳定发展的巨大优势。我国的基本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发展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其显著优势是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整个经济、社会高效、稳定发展。我国的基本经

济制度最明显的优势是把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这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我国的社会发展制度使得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从而具有凝聚全社会力量的优势。我国的思想文化制度决定了整个国家有共同的思想文化体系,由此形成凝心聚力、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优势。除了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外,我们还建立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制度,即通常讲的体制机制。比如实行改革开放、选贤任能、“一国两制”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完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当然,也吸收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还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国家治理经验以及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正是因为我们制定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制度体系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从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繁荣局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探索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当时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尽管总的方向是正确的,即要破除传统封建文化,创造符合世界潮流的“新文化”,培养科学、民主精神,塑造中华民族的时代“新人”。但在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这种文化改造的具体方向、任务、道路等,还很抽象,很不明确,所以常常流于空谈。而当李大钊、陈独秀等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逐渐确立了政治改造、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的思想,而且认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不是实行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为中国社会发展包括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确立了唯一正确的历史航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不论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七个层面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一是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典藏体系。文化体系的文献基础是典藏体系。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文化主要是传统文化形态,其文献基础是传统的儒、释、道等各家的典藏体系。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开始被翻译引进,百年之后的今天已形成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典藏体系,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文献,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以及相关的文本文献,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正是这套崭新的典藏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典藏以及其他文化典籍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文献基础。

二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言语体系。我们现在的言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为核心的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这些概念是五四运动以前所没有的。没有这些基本概念,就谈不上中国现代文化。这套言语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我国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宣传马列著作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逐步建立起来的。

三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进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了许多现代哲学知识,例如知道了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突破了历史循环论,知道了社会历史的内在结构,社会发展的趋势、道路,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等等。可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我们认知中的整个世界图景都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图

景在五四运动以前是没有的。

四是它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现在我们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很多具体学科,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学科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无数理论界的翻译家、理论家、出版家、教育家等的工作,这个学科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五是它促进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今天的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网络文化等,也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机构的建立、杂志报纸的编辑出版等均是如此。

六是它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大众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概念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如少先队员、党员、干部、人民、同志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许多节日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在五四运动之前,我们只有传统的节日,没有这些节日。没有这些新的文化要素,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

七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时代新人。10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创新发展中,不仅产生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而且产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理论家、出版家、教育家等。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很多的思想文化名家都从事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传播,如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瞿秋白、鲁迅、郭沫若、邹韬奋、华岗等。我们党培养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等更是数以万计,党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经过百年奋斗,五四时期的革命先驱们所期盼的培养社会“新人”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实现了。

从大历史观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意义更加深远。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文化才从传统形态逐步转变为现代形态,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伟大精神力量,中国人民才能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世界文明的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支柱。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指引着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并向强起来迈进;我们坚信,在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将继续指引中国人民奋勇前进,去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前景。

[参 考 文 献]

- [1][3]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年第7期。
-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 [5]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页。
- [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责任编辑:韩永涛)